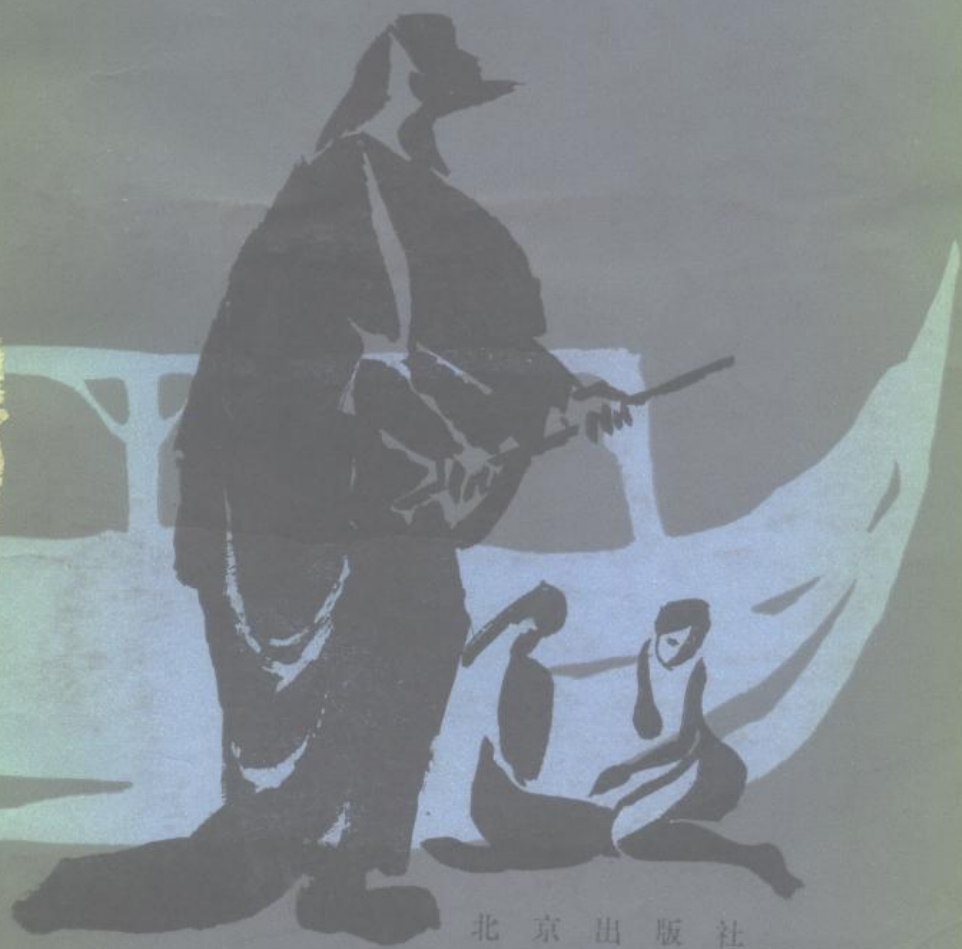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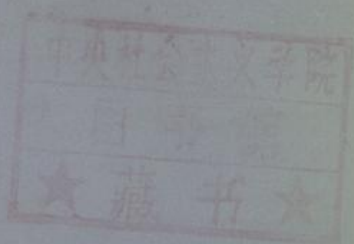


圣经文学 故事选



北京出版社

I19/1

0.23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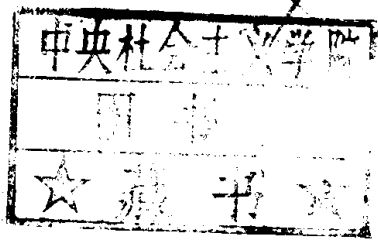
圣经文学故事选

朱维之 主编



200082739

2002/10/04



北京出版社

圣经文学故事选

朱维之 主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10,000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4,100

书号：10071·454 定价：0.85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圣经文学故事选》是从《新旧约全书》中选取的富于文学性的故事共六十二篇编辑而成的。

《圣经》——《新旧约全书》是基督教的经典。其中的《旧约全书》，原是古代希伯来民族历代积累起来的文献总集，有神话、传说、歌谣、传奇、历史、政治、诗歌、小说、戏剧等。《新约》中的“四福音书”，记载了耶稣的故事，《启示录》充满了幻想的色彩。这些作品不仅具有一定史料价值，也具有文学价值，受到西方历代文学、艺术家的称道，同时，也给他们以深刻的影响。不少文学家、艺术家以《圣经》故事作题材，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近代欧美各国的文化，就是在古代希腊、罗马和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传统中孕育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十分重视《圣经》的历史资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在他们的著作中，常常批判地加以引用。据不完全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涉及到的《圣经》人物就有八十多个。而这八十多个人物，被引用过三百多次。

尽管如此，《新旧约全书》毕竟是一部基督教经书。它

蛊惑人们崇奉上帝，宣扬上帝的圣明威严和无处不在；它劝诫贫困的人们安贫守道，死后好进“天国”；宣传禁欲主义等等，无疑起到了麻醉人民的鸦片作用。随着阶级社会的不断发展和阶级矛盾的不断尖锐，《圣经》的各种信条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所利用，成为他们对内压迫、剥削人民，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根据和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视《圣经》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肯定它在一定时期的历史作用。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圣经》所鼓吹的宗教教义却从来采取不调和的态度。列宁说：“宗教是终身给他人劳作，为穷困和孤独紧压着的人民群众到处蒙受的精神压迫的一种。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伤了自己作人的形象，忘记要求稍微过一点人所应当过的生活。”（《列宁全集》卷十，第62—63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对盲目信从宗教。关于这个问题，一八三九年六月十五日恩格斯写给弗·格雷培的信中说：“是谁给我们盲目信仰《圣经》的权利？只是那些在我们以前就这样盲目信仰的人的威信。但《圣经》是由许多作者撰写的许多片断章节组成的，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甚至一次也没有认为

自己具有上帝的神威。难道我们应该违背自己的理性，仅仅由于父母的嘱咐就去信仰它吗？”（全集德文补卷第二分册，第401页）

马克思主义不能割断历史。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取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本着这个指示，为了满足高等学校教学和外国文学研究者的需要，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圣经文学故事选》。

我们认为，此书的出版，不论在为从事外国文学、外国历史研究和教学的同志提供资料，对于文艺爱好者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提高文学修养，或是帮助读者在阅读马列著作时加深对原著的理解等方面，都会有好处的。至于作品中所宣扬的某些宗教思想，除了在正文前加以说明外，我们相信，广大读者会以正确态度对它加以鉴别和批判。

北京出版社

1982年4月

圣经文学的地位和特质

——《圣经文学故事选》序言

朱 维 之

(一) 源远流长

西方欧美各国，绝大多数是从近代才开始发达起来的年轻国家。美国的历史仅仅二百多年，西欧、东欧和北欧各国的历史也只几百年；而他们的文化发展和创新的速度惊人，大有睥睨世界之势。但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必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克思对于文化创造的历史规律曾有这样卓绝的论断：“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个规律符合历史的真实。例如西方近代文化的创造和发展，确实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这个西方文化创造的历史条件就是从过去承继下来的两个传统：一个是希腊、罗马的古代传统，另

一个是希伯来、基督教的中世纪传统。这两个历史的传统就是西方史学界所谓的“二希”——希腊和希伯来——因为罗马文化是继承希腊文化而演变来的，基督教文化是继承希伯来文化并吸收一些希腊影响而演变来的。“二希”对西方各年轻国家文化的成长，犹如哺育婴儿的两只乳房。

自从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学者纷纷学习、模仿希腊古典的传统，大力提倡自然科学、唯物论哲学和反映现实的文艺。这一点，一般文化、艺术史都说得很清楚、明确了，认为：没有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文化，便不会有近代的欧美文明。另一方面，他们和基督教中世纪的传统关系也极为密切，这一点也不容忽视。欧洲中世纪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所酝酿的文化，更是近代欧洲创造历史时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历史条件。欧洲中世纪的文化，事实上正是孕育近代文化的母体。这个做为母体的中世纪文化，正是基督教的文化。精通西方历史而具有敏锐慧眼的恩格斯说过：“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德国农民战争》）这就是说，欧洲各个新兴的近代民族、国家，在它们过去那漫长的一千多年中，是在基督教文化思想的哺育下由野蛮逐渐进到文明的；直到中世纪的末期，文艺复兴时期，才纷纷起来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化。原来“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宗教改革”时期，二者是一个文化思想运动的两种表现；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在意大利、法兰西叫做“文艺复兴”，在德意志叫做“宗教改革”。二者都是

因为当时的基督教会趋于腐朽，利用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对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压迫，不讲人道，抹煞人性。人们要求人性的异化复归，或借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或用原始基督教的精神谋求复兴。西方近代文化就在这两个运动的轰轰烈烈交叉进行中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了。

基督教的文献，主要是《圣经》——《新旧约全书》。这部书在中世纪欧洲蛮族的开化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它不只是宗教的书，也不只是政治、文学、哲学的书，同时还是当时人们必须日常遵循的法律和道德标准。近代的国家如英国的统治者便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们的国家是靠一本书（《圣经》）起家的。英国如此，其他欧洲的年轻国家也大致相同。美国更不用说了，它的文化传统是由英国的清教徒迁移过去的。

论文学，希腊的古典传统和基督教的《圣经》传统，是西方近代文学的基础。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是西方近代文学中引用最多的典故。如果说希腊神话是古希腊艺术的武库和土壤；那末基督教《圣经》便是中世纪欧洲艺术的武库和土壤。丰富多采的中世纪欧洲文艺也是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珍贵遗产。那时大教堂的宏伟建筑，琳琅满目的壁画、浮雕，以及五光十色的神迹剧、奇迹剧、骑士传奇、行吟诗歌等，多数是以《圣经》和《圣经》传说为题材而加以想象、创造出来的。这些文学艺术的创造，不仅是人类丰盛的遗产，而且是西方近代文艺发展的起点。

现行的《圣经》本子——《新旧约全书》分为《旧约》和《新约》两部分。前者三十九卷，后者二十七卷，共六十六

卷。此外还有《次经》或《经外经》十四卷（希腊文译本、拉丁文译本、马丁·路德的德文译本，十七世纪的英译钦定本和最近出版的《新英文圣经》都有这一部分），加起来是八十卷。《旧约》原是古代希伯来民族历代积累起来的文献总集。其中有神话、传说、歌谣、传奇、历史、政论、小说、诗歌、戏剧等。作品的产生年代大约是公元前十二世纪到公元二世纪之间一千多年。犹太人被巴比伦俘虏后，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一世纪之间约六百多年中，被整理编订成一部犹太教的《圣经》。另一部分作品产生年代较晚，未经正式编入《圣经》的东西，被后人编为《次经》或《经外经》。《旧约》和《次经》是古希伯来民族的文学遗产，它的编选，不完全以宗教为标准，其中有些文字优美的作品并没有宗教内容，例如《雅歌》、《以斯帖记》、《路得记》、《传道书》等。有趣的是：这些不含宗教内容的经卷却被安排在犹太教的五大节日中聚众听诵，似较其他各卷更受群众欢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大相径庭，而犹太教的经典——《旧约》却被基督教采用为《圣经》的一部分，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因基督教是从犹太教派生出来的，采用犹太教的经典做为自己立教的背景，既表示数典不忘祖，又表示自己教宗的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二因《旧约》情文并茂，它的语言、热情和幻想感人至深，是希伯来民族历代文献的集大成，是世界上极有特色的文学遗产，可借以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有利于新教的传播。

《旧约全书》三十九卷，犹太人旧时原分为律法、先知和圣卷三部分。后来经过近人的研究，更科学地把它分为经部、史部、先知和集部四部分。经部（即“摩西五经”——

《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产生年代最早，相传为摩西的手笔，实际上摩西本人是传说中的人物，“五经”不是他的作品，而是古代神话、传说、民间歌谣、故事的汇集。史部（《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等）主要记录以色列、犹太王国的形成、发展和衰亡的历史，中间穿插着很多的传说、歌谣，文笔流利，故事生动，颇能引人入胜，是史书又是文学的杰构。先知书是公元前八世纪以后，在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产生了一些先知先觉的仁人君子，热情洋溢的社会活动家，他们都是诗人的气质，富于文采，用诗歌和演说的方式向腐朽的统治者和上层阶级大声疾呼，要他们停止残酷的剥削，少行不义。《旧约》中收录了十五卷先知书，最著名的是《以赛亚书》、《以利米书》、《以西结书》、《弥迦书》、《哈巴谷书》、《阿摩司书》等。仁人君子们以自己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发为诗文，成了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奇葩。集部主要是诗歌和小说，最著名的是《雅歌》、《诗篇》、《箴言》、《传道书》、《耶利米哀歌》、《约伯记》、《路得记》、《以斯帖记》等，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二千多年来传诵不衰的作品。

《新约全书》是基督教自己的圣经，产生于公元一、二世纪，是用希腊文写的，内容有耶稣的言行录四种，即“福音书”四卷，《使徒行传》一卷，使徒书信二十一卷，加上《启示录》一卷，共二十七卷。最早的文献是《启示录》，写于公元68—69年冬春之间，是反抗罗马帝国迫害的战斗号角，用“启示文学”的象征笔法，写出一连串的幻象，表示新天新地很快就要来到，加强信徒们必胜的信心。该书中还

没有后来基督教的各种教义，唯一的伦理是禁欲。《新约》其他各卷写于公元二世纪，初步建立基督教教义。“四福音书”是《圣经》文学中占有很高地位的作品，英国唯美主义诗人王尔德称之为四首散文诗，说它们有新鲜、质朴和单纯的浪漫的魔力。（见张闻天、汪馥泉译《狱中记》第50—51页）歌德认为“‘四福音书’完全是真经，因为其中反映了基督的人格伟大，世上过去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神圣的品质。”（见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第253—254页）

无论《旧约》还是《新约》，在西方各国都是家喻户晓的，特别是散见各卷中的富于文学气味的故事，为欧美和世界其他各国的文学艺术家们或采用为题材，或引用为典故。这些古老的民间故事和史传故事，被用了又用，引了又引，作者和读者都不厌其重复，反觉得喜闻乐见。如大小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极口称赞《创世记》中的约瑟故事，说它朴素、简洁、生动、真实，是近代作者写不出来的世界性艺术典范。（《艺术论》，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64页）托玛斯·哈代说《旧约·撒母耳记下》写大卫和他的儿子押沙龙的故事的第十八章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散文，艺术上有高度的成就，等等。

（二）影响深远

《圣经》对西方近代和现代文艺作家的影响，真是一言难尽。因为西方各年轻的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是由中世纪的传统文文化直接孕育出来的。在中世纪时一般人不容易读到《圣经》，但近代不同了，他们对于《圣经》，不单家喻户晓，而且人手一册。西欧各国的语言文字的清理和规范化，往往从《圣

经》的翻译开始，例如德国的语文规范化是由马丁·路德的译经。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写了成为十六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自然辩证法》导言）英文译本《圣经》也成了英国文学语言的范本。他们的孩子从幼年起就亲炙着《圣经》，因而爱好文学。例如英国大散文家约翰·罗斯金在他的自传《往事》中说：“我母亲每天不断地逼我背诵长篇的《圣经》；我高声朗诵每一个字音，每一个难读的名字和其他东西，从《创世记》到《启示录》，差不多每年一次。这样的训练，忍耐的、准确的、坚决的训练，不但使我得以认识这本书，也使我得了不少耐劳的力量，以及对于文学的嗜好。”又如天才的青年诗人雪莱，早年就醉心于《圣经》文学，他的夫人在关于《伊斯兰的起义》的题记中说他“经常研读《旧约》中的《雅歌》、《约伯记》、《以赛亚书》等；这些作品的瑰丽的诗意，往往使他喜不自胜。”其他著名作家如雨果、霍桑、哈代、卡莱尔、安诺德、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都曾述说自己如何从《圣经》得到题材、灵感和力量。无产阶级杰出的作家高尔基也说自己爱读《圣经》，并从《诗篇》学习写作。

近代西方第一流作家的代表作往往交织着希腊神话和《圣经》的故事、名句。例如但丁的《神曲》，以罗马诗人维吉尔为导师，代表古典传统即理智；以意中人贝亚德为天府的指引者，代表中世纪传统即信仰。由于两个传统的结合产生了新旧交替时代的硕果。《神曲》中处处把现实生活和理想

放在一起，引证极博，而特多《圣经》的典故。如全书的第一句“当人生的中途”（三十五岁）就用了《圣经》的典故，《旧约·诗篇》第九十篇：“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神曲》第二部和第三部大谈神学问题，实是有关《圣经》的问题。莎士比亚也兼用希腊、罗马的和《圣经》的典故和材料，美国樊戴克曾做过统计，莎士比亚的每一出戏引用《圣经》的平均数是十四次。约翰·弥尔顿的三大名诗《失乐园》、《复乐园》和《斗士参孙》，全部采用《圣经》的故事为题材。诗中随处都可遇见希腊、罗马的神话和《圣经》的典故。这三个作品更明显地显示为两个传统结合的产物。克罗普斯托克的长诗《救世主》主要写基督受难和复活升天，获得圆满成功，抒情性强，充分发挥了诗人的特长。歌德是大作家中最反对宗教迷信的，但他在写《浮士德》时，却模仿《旧约·约伯记》的故事写了《天上序曲》；写到全剧的结尾处，又不得不借用《圣经》的图景和意象来做结束。歌德自己说：“得救的灵魂升天这个结局是很难处理的。碰上这种超自然的事情，我头脑里连一点儿影子都没有；除非借助于基督教一些轮廓鲜明的图景和意象，来使我的诗意获得适当的，结实的具体形式，我就不免容易陷到一片迷茫里去了。”（《歌德谈话录》第244页）约翰·班扬的著名长篇寓言小说《天路历程》从头到尾完全穿插着《圣经》故事、箴言和其他材料；但它流传之广，译本之多，据说仅次于《圣经》。拜伦用《旧约》中该隐杀弟的故事写成诗剧《该隐》，赞颂叛逆者；又用《旧新约》其他故事写了《希伯来的旋律》二十多首，其中如《耶弗他的女儿》、《约但河两岸》、《扫罗》、《扫罗在最后战役前的歌》、《在

巴比伦河边坐下来哭》等诗，是很出名的。拜伦还写了诗剧《天和地》，剧情是天使沙米阿沙和人间该隐的孙女阿和利巴玛结婚。不过，这故事不见《圣经》的正文，而出于《圣经》传说。

法国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者尽量采用古代的题材而不用《圣经》的题材，生怕渎圣。但其中最著名的悲剧作家拉辛却于晚年不满于法国当局的高压政策时，发愤采用《圣经》的题材写了两个剧本《以斯帖记》和《亚他利雅记》，被雨果叹为“奇妙”、“高超”甚至“崇高”；特别是《亚他利雅记》，女主人公做为一个太后而篡夺孙子的王位，结果被群众打死，而孙子被拥上王位。作者敢于在绝对君主专政的年代中，写出这样群众打死无道专权太后的场面，令人起敬。雨果在论到《圣经》时说：“正象整个大海都是盐一样，整部《圣经》都是诗。这部诗谈论当时的政治。……这本书为了要参与人世间的，为了有时主张民主、有时主张破坏偶像，因而就不够光荣，不够高超了吗？如果说《圣经》里没有诗，那末，诗又在哪儿呢？”又说：“一个民族的黎明时期，抒情诗的光彩夺目、富有幻想的、而在一个民族的衰微年代，则又沉郁晦暗而惯于思考。《圣经》喜气洋洋地以《创世记》开篇，而语气逼人地用《启示录》结束。”（柳鸣九译《雨果论文学》187页与43页）

《圣经》对于二十世纪初以来的现代各流派作品影响也不小。德国托玛斯·曼的长篇小说《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是众所周知的了，西班牙伊巴涅兹的长篇《启示录四骑士》也名噪一时，比利时梅特灵克的剧本《耶稣与淫妇》，英国王尔德的剧本《沙乐美》，美国尤金·奥尼尔的剧本《拉撒

路笑了》和福克纳的小说《押沙龙，押沙龙！》，苏联诗人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剧《宗教滑稽剧》等，都是借用《新旧约》的故事来影射或讽喻当前事物的。

散见于《圣经》的故事，源远流长，而影响又这么深远；到了今天，更因欧美文学对世界各地的影响，《圣经》的影响更有扩大范围之势。正如鲁迅所说：“次为希伯来，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摩罗诗力说》）我国对《圣经》的翻译，经过几百年，几十人的辛勤劳动，起初是个别人的试译，后来经过协作商量修订，“五四”运动的前夕终于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圣经》的中文译本很多，除了文言的和白话的两种以外，还有各地方言的译本（如广州话、福州话、厦门话、苏州话、温州话、宁波话、客家话等方言译本）。七十年来，其中最好的通行本是“官话和合本”，就是经协作修订的白话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人反对白话新文学，说这些文章不能算新，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这话虽然似乎可笑，可也说出了《圣经》中的白话文译本和我国新文学的关系。我国新文学作品中也渐渐引用了一些《圣经》的名词和典故，如“洗礼”、“天使”、“乐园”、“天国”、“启示”、“复活”、“福音”、“十字架”、“圣母”、“忏悔”、“亚当”、“夏娃”、“先知”、“犹大卖友”、“所罗门的智慧”等等，常在作家笔下出现，这就是直接或间接受了影响的明证。我们对于这些《圣经》的典故和故事，和对希腊神话或中国神话一样，不能一概说是迷信的东西。神话、传说、歌谣都是民间不自觉而创造的艺术品，是前人留给后人的艺术遗产。我们中间

有谁把普罗米修斯偷火给人的神话故事看做迷信呢？有谁把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嫦娥奔月、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神话传说看做迷信呢？相反，它们是远古流传的美丽故事，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其影响之深远，迄今未艾。

（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圣经》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宗教是对立的。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深知《圣经》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and 它的特质，并没有把它单单看成宗教的文献而贬视为单纯迷信的东西，都把它当做文学宝库来看，当做重要的历史资料来看。他们很熟悉《圣经》，并且加以研究、批判和引用。马克思在上大学时，曾听过布鲁诺·鲍威尔讲授《旧约·以赛亚书》的课，据《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的作者柏拉威尔说，马克思年青时写过诗歌、小说，一遇机会就引证《圣经》等著作；在他的文章中一再运用了马丁·路德的《圣经》译本的遣辞、造句、韵律和人物故事。他倾心于世界古典文学名著，包括《圣经》在内，他频繁地引用荷马、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的作品和路德的《圣经》译本。

这里举几个例子，说明他们是如何引用《圣经》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到善恶问题时，认为“恶”也是产生艺术的母亲。这个有风趣的论点达到高峰时就引证了《圣经》的典故说：“难道，从亚当的时候起，罪恶树不同就是知善恶树吗？”（《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第416页）亚当和罪恶树的典故，是《旧约·创世记》第三章所说的故事：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乐园中